

中大政治学评论

Politics Review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Vol.6)

肖滨——主编

第6辑

中大政治学评论

Politics Review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Vol.6)

肖 滨 —— 主编

第
6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大政治学评论. 第6辑/肖滨主编.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32-2298-4

I. ①中… II. ①肖… III. ①政治学-研究-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1901 号

责任编辑 王亚丽

美术编辑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中大政治学评论(第6辑)

肖 滨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 ewen. cc www. hibooks. 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3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298-4/D·68
定价 28.00 元

中大政治学评论

主 编 肖 滨

执行主编 王 清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 | | |
|----------------|---------------|
| 白 夏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 | 陈 峰 (香港浸会大学) |
| 郭巍青 (中山大学) | 景跃进 (清华大学) |
| 李连江 (香港中文大学) | 林尚立 (复旦大学) |
| 吕晓波 (哥伦比亚大学) | 马 骏 (中山大学) |
|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 | 史卫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 | 肖 滨 (中山大学) |
|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 | 王浦劬 (北京大学) |
| 杨大力 (芝加哥大学) | 张 鸣 (中国人民大学) |
| 张凤阳 (南京大学) |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
| 朱光磊 (南开大学) | 周光辉 (吉林大学) |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 | | |
|---------------|------------|
| 樊 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 | 郭忠华 (中山大学) |
| 何建宇 (清华大学) | 何俊志 (复旦大学) |
| 黄冬娅 (中山大学) | 李永刚 (南京大学) |
| 刘 鹏 (中国人民大学) | 谭安奎 (中山大学) |
| 王 清 (中山大学) | 叶娟丽 (武汉大学) |
| 尹 钦 (中国政法大学) | 张 健 (北京大学) |
| 张紧跟 (中山大学) | 朱亚鹏 (中山大学) |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战略、
路径与对策”(项目编号：12&ZD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总 序

如果把编辑、出版这套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列丛书视为我们的一种学术志业选择,那么,激励我们进行这一选择的理由有三:

其一,持续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行政学在中山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时,即将1905年广东开办的法政学堂纳入其中,并设立政治学系,这一学科建制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才告中断。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大任教职的不仅有著名政治学家萨孟武、邓初民和著名政治哲学家、宪法学家张君勱等人,而且有不少默默耕耘的政治学、行政学教授。在一份由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室提供的1932年至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名录的资料上,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政治学、行政学前辈的名字,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胪列其中几位:

邓孝思,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政治学说、政治学史。

詹显哲,政治学教授,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兼政治经济科,主要从事国家学、国际政治、政治史的研究。

刘永南,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毕业,主要从事各国政党、地方自治的研究。

邱昌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宪法、地方自治的研究,著有《议会制度》、《地方自治》等。

范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主要从事宪法、行政法的研究。

梁贞,法国国立第戎(Dijon)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政学、行政学、民族运动史的研究。

胡汉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地方自治、中国制度史的研究。

梁朝威,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现代政治思潮的研究。

蒋竹林,美国密歇根大学市政管理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各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

以上只是从一份简略的档案资料上获取的信息。不过,由此我们已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进行仔细的收集、发掘和整理,一定可以再现一个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那将是一个浸透了前辈学子心血的历史传统。可惜,这一传统因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而随风飘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老一辈著名政治学与行政学家夏书章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在王乐夫教授的领导与努力之下,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学科才得以恢复、重建,并获得较大的发展。

在走向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先前学者努力的基础上,延续学科的历史传统,承接前辈学人的学术风范,是值得后生学子不断思考与实践的大问题。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可以视为我们对此问题交出的一份远远没有结束的答卷。

其二,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增长。

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对政治漫长的经验和长期的思索中,逐步形成了一门被称之为“政治学”的知识系统或者说一门科学:“在‘科学’一词的广义上,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掌握和组织的信息和理论是知识。这种知识既是真实的,又是有用的。这种知识也是积累而成的。”^[1]

正视或者面对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我们确实需要反对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古人对它无所不知,我们只能借助和吸取他们的智慧;二是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方法是摆脱过去的羁绊;三是政治学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知识,它纯粹是本土经验积累的产物。这三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接受,原因在于:第一种观点封杀了政治科学知识增长和知识创新的必要性,意味着政治学科知识之树再也不结新果;第二种观点破坏了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连续性,其结果是政治科学知识之树的根被彻底挖断;第三种观点否定了政治科学知识跨国界交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使政治科学之果沦落为不能进行国际交流的“土特产”,从而最终失去知识的价值和品格。毫无疑问,对政治科学知识系统的发展而言,这三种局面都是灾难性的。

因此,如何借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活动和知识交流,建立起政治学科的国际标准和全球视野,同时,通过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推动政治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使政治科学这棵知识之树在中国的学术园林中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是从事政治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即是希望为此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其三,为中国政治趋向法治民主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1]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上册),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提供政治学的支持。

100多年前,目睹19世纪时代巨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不朽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中断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他确信,这将导致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面对这一变革,他提出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然而,托克维尔忧虑的是:“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惊涛又能把我们卷进运河,推回深渊。”在托克维尔看来,走出这种深渊,需要一种政治知识系统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呼吁:“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1]

显然,如果把这一呼吁运用于当代中国,那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说引向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而全新的社会或者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不仅为我们奉献一种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而且为中国政治实现向法治民主的转型、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智慧资源和操作技术。确立这样一门政治科学无疑是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的学者的一种历史性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可能需要几代人持久而坚韧的努力。编撰、出版这一套政治学丛书正是我们作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虽然是极小的一步。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把本丛书的编撰、出版视为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定为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因此,在整体布局上,本丛书将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论著系列,具体包括学术论文集、政治学评论和学术专著;二是教材系列;三是译著系列。在操作方式上,我们将采取渐次推进、积少成多的策略,以期通过长期的努力实现规模效益。

我们渴望同行专家的批评。

我们期待读者朋友的指正。

我们企盼得到大家的呵斥与支持。

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1] 以上引文见[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良果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目 录

民族国家与国家认同

身份认同、民族塑造与国家建构

——对“台湾民族论”的批判性分析…………… 路 阳(1)

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

——对土地改革时期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李海金(14)

公民身份认同及其内在的三种分形…………… 郭台辉(40)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义取向

——基于罗尔斯思想的质疑…………… 林炫向(53)

公共领域与政治民主

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关于亚洲社会中两者关系的

十个命题和九项思考…………… 菲利普·施密特(69)

监督式民主与公民社会…………… 约翰·基恩(89)

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合作博弈因素分析…………… 何建宇 刘涛雄(111)

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建设

“中国政治发展南北对话会”发言选录

…………… 肖滨 徐斯俭 赵全胜等(128)

民族国家与国家认同

身份认同、民族塑造与国家建构 ——对“台湾民族论”的批判性分析

路 阳*

【摘要】 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困扰台湾社会的重要问题。台湾社会在民族和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分歧对整个社会生态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以民族塑造和国家建构为核心的“台湾民族论”是“台独”重要理论流派之一。这一类观点的实质是通过证明“台湾民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或试图建构新的“台湾民族”，来为其“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提供理论基础。“台湾民族论”主要有“血缘论”、“文化论”、“超越论”和“认同论”等相关流派。本文从民族和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对其实质和总体特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说明。尽管这些观点的荒谬性并不难为世人所知悉，但经过颇具迷惑性的包装和动员宣传，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仍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关键词】 “台独” 身份认同 民族塑造 国家建构 台湾民族论

“台独”(即“台湾独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台湾岛内及海外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试图将台湾从中国永久脱离出去,并以“独立建国”为最终目标的思潮和运动。^[1]“台独”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理论与行动,两者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推动了“台独”运动的发展。“台独”的思潮和观点是“台独”运动的思想基础,并逐步发展为一系列的“台独”理论和主张。它们作为“台独”运动进行宣传 and 动员的理论依据,对于获取岛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推进“台独”运动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台湾民族论”是较早出现的“台独”理论之一。“台独”势力为推动自

* 路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1]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抗运动和斗争是以反对外来侵略,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为目标,也曾出现“台湾独立”的主张和口号。但其与本文所指的“台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只要具体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反抗运动的宗旨和目标,就不难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身发展,开始寻求建立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的理论基础,以此作为台湾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1]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是不同于汉民族的另一民族或新民族。这一类观点根本否认台湾人与大陆人同属中华民族、同源同种的事实。“台湾民族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独”运动早期的影响很大,但在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几乎偃旗息鼓。它在80年代被再度推出并得到发展,和其他“台独”理论相互融合成“台独”运动和思潮的理论基础。

“台湾民族论”的实质是通过证明“台湾民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或试图建构新的“台湾民族”,来为“台湾独立”提供理论依据,以实现其“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2]围绕这一目标,不少“台独”论者试图从血缘、文化、历史和认同等不同方面来论证“台湾民族”的客观存在或建构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了这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和主张。本文主要对“台湾民族论”的各种观点进行梳理介绍和批判分析,为学术界关于“台独”理论思潮的相关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台湾民族论”之“血缘论”

20世纪50年代,“台独”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廖文毅。他1910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西螺镇的大地主家庭。廖文毅少年时期就读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创办的淡水中学,此后又在日本、中国大陆和美国求学。他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后返台湾从事实业。日本投降之后,他曾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高级官员,后因竞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制宪国大代表均落选,而逐步走上了“台独”之路。^[3]早期的“台独”运动主要在海外发展,为了证明其“台独”的正当性并获取国际支持,这种“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1] 在这里有必要对民族、国族和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进行区分。本文所指的民族多具有国族的意涵,可理解为国家试图建构出来的一个国家化的民族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台独”论者所指的民族具有“国族”的意义。而族群则更多指称现代社会中有着共同背景与出身的人口或文化集团。国族定义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而族群定义更多是一种社会文化概念。台湾岛内有“四大族群”之说,即将台湾人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和外省人四大群体。相关问题可参见郝时远:《台湾的族群政治与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 如“台独”论者黄昭堂就认为“台湾民族主义”就是“独立、建国运动”。他曾提出,“‘民族’(nation)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建国运动,台湾人不想被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唯一的一条路,只有独立,只有建国,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参见黄英哲:《扶桑书剑记》,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3] 关于廖文毅生平与参与“台独”活动的相关情况请参见陈佳宏:《海外台独运动史》,前卫出版社1998年版;陈正茂:《台湾早期政党史略(一九〇〇—一九六〇)》,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廖文毅投降始末》,自由时代出版社1988年版。

“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的观点是推动“台独”最为简洁和便于操作的理论观点。廖文毅提出的“血缘论”(又称“混血论”)是早期“台湾民族论”的主流观点,在“台独”势力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台湾民族”无论是人民的血统还是文化,都是与中华民族相异的另一个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成立台湾共和国。廖文毅试图通过强调台湾人与大陆人在血缘上的差异来论证台湾人是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的新民族。

廖文毅在《台湾民本主义》中主张:“先天的我们(台湾人)继承印度尼西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福建、广东以及日本人的血统,换句话说,融合原住民、汉、日、拉丁、条顿诸民族的血统。”^[1]他进而提出:台湾人与大陆人“不仅血统不同,而且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现实政治、经济生活等均不相同”,台湾民族是“东方和西方的诸人种与台湾原住民融合而成的混合民族”(张莉,2007:75)。他在另一文中提出,“台湾人民是混血人种,与周围任何国家,并无自然联系。”(王晓波,2001:310)

前面已经提到,“台独”论者提出“台湾民族”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所谓“民族自决”来实现“独立建国”的最终目标。他在“血缘民族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台湾民族自决论”。也可以说,“台湾民族论”是“民族自决论”即“台湾自决论”的理论基础。廖文毅在《告台湾八百万同胞宣言》中主张:台湾问题“必须依民族自决原则,以国际协定所保障的台湾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台湾来解决”(全国台湾研究会,2002:500)。这也是“台湾民族自决论”被首次提出,廖文毅等人试图通过“民族自决”的手段实现其“台湾独立”的目标。

这种通过强调血缘差异而塑造“民族”的“台湾民族论”,其理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甚至连“台独”运动内部也对他有所批评,认为其观点不具操作的可行性。如黄昭堂指出,这种“混血论”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反映,而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严谨论证。他针对廖文毅提出:“为了证明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不同,‘混血论’可能是一个简洁的方法论。不过如果混血仅止于与原住民的混血还可以,欲连荷兰、西班牙、日本也套上,尤其将……葡萄牙也弄在一起了,甚至连条顿也有份,这难免以偏概全,矫枉过正了。”(黄昭堂,1994:203)另一位“台独”代表人物王育德对于廖文毅的“血缘/混血论”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对“混血论”的过高评价十分危险。王育德在其论著中指出,“此种所谓台湾民族混血论,不但无法为现仍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所接受,甚至反而会引起对独立运动的反弹。”“直言之,几乎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台湾人是多重混血的说

[1] 参见廖文毅:《台湾民本主义》,台湾民报社1956年版。转引自黄昭堂:《战后台湾独立运动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载施正锋主编:《台湾民族主义》,前卫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法。”(王育德,2002:103)

1956年,廖文毅宣布放弃其“台独”理念并向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投诚。他在返台时表示,“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论是客家人或闽南人都是优秀的炎黄后裔,客家人之祖先,固然是中原衣冠的南渡,闽南人也是五胡乱华的时候,渡江避难的故家大族。我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力,血浓于水,家有谱牒,任何人不能分化我们的骨肉,任何方式也没有分化我们的效果。”(王晓波,2001:301)这可以说是对其“混血民族论”荒谬性的最佳注脚。

二、“台湾民族论”之“文化论”

王育德是早期“台独”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他1924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县的地方望族家庭。1947年其兄王育霖于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王育德也在逃往日本后入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语文学科,成为一位知名的台语语言学家。王育德在日本创立了“台独”组织——台湾青年社和理论刊物《台湾青年》,被视为“台独”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1]“台湾民族论”是贯穿其所有书籍和文章的主线之一。有“台独”人士指出,他对“台独”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台湾民族理论某种程度的精密化。这一类“台湾民族论”观点也可以被称为“文化论/同化论”。

王育德于1963年写成的《台湾民族论》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汉民族”不是“民族”。民族是资本主义诞生后的产物,汉民族有四千年的历史是“大笑话”。对于“台湾民族”的形成过程,他在书中提出:“我认为台湾民族实质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起义之后,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台湾民族已名实兼备100%完全成立。但这并不成问题。民族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后才能期待完整。”(王育德,2002:102)也就是说,“台湾民族”虽已“实质成立”,但仍需要建立“民族国家”来最终加以完备,也就是经由“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台湾必须建立民族国家以后,通过国家的“容器”,精练民族这个“内容物”,才导致民族的彻底形成。他在文中也提出:“台湾民族虽因尚未具备国家而不完整,但还能保持其实质的一面。我相信台湾人一旦建立自己的国家,将立即成为高纯度的民族,并极易发展成优秀的民族国家。”(王育德,2002:103)

王育德提出了不同于“血缘论/混血论”的观点,通过论证台湾人在语言、文化方面与大陆人的差异来论证“台湾民族”的“合理存在”,并形成了

[1] 关于其生平与参与“台独”活动的情况可参见王育德:《王育德自传——出世至二二八后脱出台湾》,吴瑞云译,前卫出版社2002年版;张凤山:《“台独”的历史演变》,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

一整套对于台湾历史发展的解释。^[1]他认为,台湾在日据时期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的“新文化”。尽管台湾的文化承载了汉族文化,加之本地已有的山地文化(原住民文化)以及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和后来的西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文化。王育德强调语言对文化产生影响并进而实现民族的塑造。也就是说,日语的使用帮助台湾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并造成了台湾的质变,因此独特的“台湾文化”塑造了独特的“台湾民族”(张春英,2002:40)。他曾提出:“日语的使用并非仅止于语言的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手段,学习量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还会规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观。当然,语言背后的文化体系的优劣对这一点发挥极大的作用。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台湾人由于日语和日本文化而从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社会,因此日语似乎可以说给台湾人带来相当大的质变。”(王晓波,2001:306)也就是出现了产生“质变”的、不同于“中国人”的“台湾人”。

不少学者对于王育德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晓波认为,“文化论”的说法是一种“人格殖民化”的反映。日治和西化都是殖民化,只能产生殖民者的文化而不形成被殖民者的文化。若以这样的“新文化”来主张“台湾独立”,其结果就是加深台湾的殖民化(王晓波,2001:316)。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因革损益之间,毕竟仍有主从之别。这种“新文化”塑造“台湾民族”的推理论证过程并不能够禁得起历史的推敲而令人信服。

三、“台湾民族论”之“超越论”

早期“台湾民族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史明。史明原名施朝晖,1918年出生于台北市士林地区。他于1937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攻读,在求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于1942年毕业后到大陆“支援抗日”。史明后因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不同认识而于1949年返回台湾,此后便开始从事“台独”活动。他主要运用殖民地理论等社会主义理论来作为其分析基础,通过重新解释台湾历史的方法而形成了其“台独”的理论主张。与廖文毅和王育德不同,史明承认台湾人与中国人具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与文化特质,都属于同一种族的汉族。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1] 有学者对于“台湾民族论”和“台独”史观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参见汪小平:《“台湾民族论”与台湾史论述——以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为例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87—609页。

了“超越论”的“台湾民族论”观点。他认为,两岸长期隔绝,经过三百余年的社会发展,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已经超越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如他后来所说:“在种族上,汉系台湾人虽然和中国人一样同属汉族。但是,在民族上,台湾人已形成和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黄英哲,1991:30)

《台湾人四百年史》是史明的标志性著作。该书在“台独”人士中颇有影响,被奉为经典之作。他在书中提出:台湾社会和台湾人一直都遭受“殖民统治”(荷兰、日本、清朝、国民党政权),清朝以来更明显地存在这种“殖民地”性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他认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台湾终于打开了与中国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基础与社会基础——继之在日本统治时代,因日本帝国主义基于本国利益而强行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结果,‘台湾’乃更明确地确立了其独特的民族存在”(史明,1998:1087)。

在该书的序言中,史明就将台湾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以其“台湾民族论”观点作为其《台湾人四百年史》的预设前提和立场。他进一步论证道: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相互隔绝的地理条件下,经过三百年的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发展与反殖民地斗争,“到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大体上已超越(克服、扬弃)了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范畴的社会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也就是说,台湾在与中国大陆相隔绝的地理社会环境下,经过了四百年独自的移民,开拓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发展,而形成在社会上和心理上均与中国和中国人迥异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史明,1998:688,1086)。

1968年,史明发表《台湾民族——其形成与发展》一文,更明确提出其“台湾民族论”的观点。他认为,台湾社会经过四百年来的移民与开拓,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以及常年的殖民地解放斗争这些历史过程,从华南移居过来的汉人开拓者与其后代为主要的成员,并和原住民共同居住而吸收同化它。“结果,以台湾特有‘共同地缘’(自然地理环境)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共同命运’(社会环境)为主要因素,逐渐形成单一的、固有的统一共同体民族,并且成员之间的共同意识,也随之发生。就是说,到了20世纪的今天,在台湾岛内已经形成了和近代民族概要吻合,但是和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台湾民族’。”(史明,1994:209)

史明将台湾社会定性为“殖民地”性质,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复合体。如他在《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书中提出:“凡是殖民地社会,由于外来的政治统治者又同时是经济剥削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重叠,所以民族斗争势必以阶级斗争为基础,阶级斗争也要通过民族斗争表现出来。”“台湾社会、台湾人以及中国社会、中国人,在种族上同样属于‘汉人’,但是,过去四百年台湾固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区分出两个

不同的民族,也就是‘台湾民族’和‘中华民族’了。”(史明,1995:185)史明认为,1945年后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后进行的统治是“以美日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为背景,继承了对台湾及台湾人的旧殖民地统治的衣钵”。这使得“台湾人及中国人的民族界限扩大并深化,造成殖民地特有的社会结构”。他进一步认为,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矛盾包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民族矛盾是政治矛盾的核心。史明提出“殖民地”社会的二重结构为:

台湾、台湾人=“台湾民族”=本地人=“殖民地”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台湾人意识

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外来者=“殖民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大中华思想

按照他的观点,“台湾民族”形成之后,便开始反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至此,史明将“台独”运动的性质归结为民族解放运动。

史明“台湾民族论”观点的核心之处在于,对“台湾民族”的论证和“悲惨历史”的诠释。实际上,虽然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和文化同化政策,但他们的自身文化并无本质的改变,但台湾人民共有的汉民族的民族性仍然留存,民族文化的血脉畅通不绝。史明的“超越论”观点与日本统治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同时,他也无法具体说明“台湾民族”的特征及其和中华民族的实际区别。^[1]另一方面,史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社会矛盾的分析也颇具片面性。他将台湾“本省人”看作“台湾民族”,而把1945年后迁台的“外省人”看成“另一民族”,这样就把客观存在的省籍矛盾(地方主义)层次的摩擦上升为“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层次的摩擦。已有学者指出,战后台湾社会矛盾实际上是有其特殊的社会矛盾和省籍矛盾这两条互相交叉的线索,而阶级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轴。而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所衍生出来的省籍矛盾,则是阶级矛盾作用下的一种特殊社会矛盾形式。^[2]从根本上说,史明的“台湾民族论”观点缺乏民族学上的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台湾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仅是为实现“台独”目标而进行宣传 and 动员的一种“工具性”的理论主张。

[1] 对于史明理论的批判可参见许南村编:《史明台湾史观的虚构——揭破一种伪托历史唯物论的台独史观》,人间出版社1994年版;林劲:《“台独”研究论集》,海峡学术出版社1993年版。

[2] 参见陈国兴:《战后台湾社会矛盾的分析——兼驳史明的“民族矛盾论”》,载许南村编:《史明台湾史观的虚构——揭破一种伪托历史唯物论的台独史观》,人间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24页。

四、“台湾民族论”之“认同论”

如前文所述,早期“台湾民族论”强调血缘、文化、语言和历史等因素,以此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岛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台独”运动获得了极大发展,各种“台独”理论主张也不断出现。这其中,以认同为核心的“认同论/建构论”是“台湾民族论”的最新观点。

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觉醒提升了岛内人民的民主诉求,台湾当局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日台断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外条件使台湾当局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这一客观形势迫使国民党政权开启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族群/省籍”问题不可避免地牵涉其中,导致台湾政治转型具有“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双重特征。^[1]台湾民主化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和“民族/国族认同”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台独”论者以认同为基础进行的“民族建构”论述和进行政治与族群动员都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相伴始终的,并导致了台湾社会整体的认同危机。

“认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以认同(自我或他者)而非血缘、文化等原生因素为同一民族的构成要件。它主要遵循“认同—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线索来进行“台湾民族”的建构,其最终目标仍指向“独立建国”。如有学者将“台湾民族”定义为:“由于台湾过去及现在的遭遇(历史环境)而产生共同的台湾独立意识,视台湾的兴衰存亡为同一命运的一群人。”(许永华,1996:93)如施正锋认为:“‘台湾民族’(Taiwanese Nation)是指所有爱台湾、认同台湾、愿意为台湾打拼的人,不分种族、族群或省籍之别;这里强调的是对这块土地的爱,而非具有共同血缘、文化的‘汉民族’。”(施正锋,2001:325)他认为“台湾民族”是“经过想象而来的共同体,除了建立过去的集体记忆、现在的共同经验,更要建构未来的共同愿景;也因此,民族的认同是可以经过选择而取得。开明的台湾民族主义者应该会接受政治民族的定义,也就是如何将多元族群塑造为台湾民族”(施正锋,2002:207)。应该看到,经过长时期的社会整合与地理上的独立存在后,台湾社会中发展出某种群体意识(台湾意识)是很正常的情况。真正的危险性在于,这种意识受到“认同论”影响将有进一步发展为新的民族/国族和国家认同的趋势。

[1] 可参见陈孔立:《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路阳:《台湾政治转型的过程和特点——以“本土化”和“民主化”为视角》,《现代台湾研究》,2009年第6期,第14—19页。